



经验与星丛：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

The Experience and Constellations :
The Study of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郑伟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验与星丛：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

The Experience and Constellations:
The Study of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郑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验与星丛：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郑伟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3-23429-5

I. ①经… II. ①郑… III. ①阿多诺(Adorno, Theodor
Wiesengrund 1903—1969)—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0778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部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JINGYAN YU XINGCONG ADUONUO FOUDING DE BIANZHENGFA YANJIU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 mm×980 mm 1/16

印 张：12.25

字 数：203 千字

版 次：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策划编辑：唐闻笳 责任编辑：梁宏宇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毛淳 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民 责任印制：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大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星丛”：非同一性逻辑的认识论基础 (12)	
第一节 本雅明的“星丛”：救赎式的世界图画	(12)
第二节 阿多诺的“星丛”：关于主体的限制	(31)
第三节 阿多诺的“星丛”：超越性理念的陨落	(37)
第二章 “星丛”：非同一性的认识论模式 (45)	
第一节 “星丛”概念与非同一性的认识论模式	(45)
第二节 “星丛”与传统认识论逻辑	(54)
第三节 “星丛”与启蒙理性批判	(65)
第四节 “星丛”与“马克思”的距离	(71)
第三章 “经验”：一种社会解读范式 (81)	
第一节 “否定的辩证法”中的“经验”概念	(81)
第二节 “经验”与“自由”	(89)
第三节 “经验”概念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理论困境	(98)
第四节 “经验”：主体性的高扬抑或失落	(105)
第四章 “星丛”与“经验”：认识论与价值论的混淆 (113)	
第一节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113)
第二节 阶级问题与阶级立场	(125)
第三节 现代社会的历史评判	(137)
第五章 “解放”与历史唯物主义 (145)	
第一节 主体性解放与人的解放	(146)

2 经验与星丛：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

第二节 “解放”：“社会的解放”与“个体的解放”	(158)
第三节 历史的图式何以可能	(167)
参考文献	(180)
后 记	(186)

导 论

“否定的辩证法”^①极易引起误读。这种“误读”首先来自初次阅读“否定的辩证法”时所产生的难以名状的疏离感：各种概念不加说明、随手拈来式的使用，思维的跳跃，语言的晦涩，等等。随着阅读和对背景了解的深入，我们愈加发现，“否定的辩证法”有意无意中呈现出的支离破碎、晦涩激进的理论外观，与阿多诺本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学生运动中所扮演的（用我们的传统眼光来衡量的）“保守”^②角色之间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言行不一”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们思维定式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或“思想家”的高大形象，引起了我们对他的理论诚实性的质疑。在这一问题上，尤其对于习惯了精致体系、严密逻辑和高亢精神的传统理性主义的拥趸者们来说，更加容易演变成强烈的拒斥感。即使上述情况在我们反思西方现代性得失的过程中慢慢得以重视和克服，但更严重的问题又随之显现：“否定的辩证法”不再坚持和拥护我们以往的生活中习以为常并认为是无可置疑的任何东西——它不仅要打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让我们失去习以为常的整个世界，甚至让我们通过丧失自身的代价去“仅仅”实现一个“重新认识你自己”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它既不能保证这种“重新认识”等同于“再度获得”，也不能保证能否获得成功。这就让习惯了“必然性”“铁的逻辑”的传统辩证法的我们在丧失了理论安全感的基础上，更加难以理解和接受。

不仅是理论外观及其感受，对于阿多诺“否定辩证法”内容的分析、解读乃至反驳和批判，同样存在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例如，他为什么会采取“崩溃的逻辑”或“绝对否定的逻辑”的形式？他为什么在对历史的分析中没有明确主张（实际上是“疏远”）正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历

-
- ① 本书所探讨的“否定的辩证法”并不局限于阿多诺的著作《否定的辩证法》（本书将阿多诺译为阿多尔诺——编者注）文本本身，而是把“否定的辩证法”作为阿多诺哲学的一种基本视野和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以上述基本视野和思维方式审视阿多诺哲学的全部著作及其基本理论立足点，并从这种基本的理论立足点阐发“否定的辩证法”对现代文明的理解和对未来社会的价值追求。
 - ② 在后文中我们将会指出，阿多诺实践上的“保守”，与其理论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并不存在矛盾和冲突。之所以会产生对“否定的辩证法”的“保守”印象，是因为我们对“否定的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和价值立场之间关系的误判。

史进步论”？为什么他的哲学会给人以“反人类文明”的印象？等等。如果单纯地从逻辑特点和思维方式演进的层面进行这种理论分析，我们会得到“否定的辩证法”“只否定而不建构”的理论印象。事实上，如果我们联系到“否定的辩证法”的理论出发点和基本立场（“经验”概念），以及在这种立场中基于“经验”概念的“星丛”式的世界逻辑图景，我们将会发现，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批判和“解构”的外观虽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建设性的观点仍然隐藏在“崩溃的逻辑”的深处——对现代文明的深刻认识和力求对现代文明主要形式的彻底反思。

某个作品抑或某种思想在其产生之后，之所以能够被不断解读，不仅在于作者与读者群体的语境共通，而且在于作者对某个时代思想把握的彻底性和深刻性。“否定的辩证法”之所以仍然能够与存在巨大时空差异的当代中国读者发生交集，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相当程度上的共同语境——现代社会，并且存在一个共同的理论使命——对现代社会的反思。虽然二者存在社会性质和制度上的差异，但“否定的辩证法”对现代市场经济带来的意识形态后果及其现实影响的分析、揭露和批判，仍然能够给予我们巨大的启示。对于力求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立场、建设“和谐社会”、追寻“中国梦”的我们来说，“否定的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批判和反思本身就是“建设性”的。它让我们看到，在一个商品经济、现代科技和形而上学“完美结合”的意识形态社会里，个体谋求解放的道路是何等的曲折、复杂，乃至希望渺茫。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把“否定的辩证法”的价值追求总结为一种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乃至在现代性社会中，以全面反思和批判为前提的、个体式的“自我救赎”，亦即个体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定位自身以及如何寻求“解放”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现代社会中的“康德问题”——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是什么？能做什么？应该希望什么？

对上述问题的解答，需要明确两个基本前提。首先是历史和理论参照物的问题，即阿多诺哲学的主要批判对象是什么以及其批判的原因何在。只有澄清了这一问题，我们才能明确“否定的辩证法”的理论立场。其次是理论诉求的问题，即在这种批判背后，他试图维护和拯救什么。只有厘清了这一问题，我们才能看清“否定的辩证法”的价值追求。另外，在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或许还能进一步深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离“马克思”究竟有多远？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理解，到底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借鉴性视角及经验教训？

哲学批判的对象本身就表明了理论的关注点，其批判形式则表明了理

论自身的逻辑边界和思维模式。“否定的辩证法”的初衷并不是全盘反对整个西方传统哲学、整个人类文明传统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也不是独断论式地试图完全拒斥、抛弃传统哲学的理性思维方式和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切，而是一种在现代社会之中实现“自我救赎”的方案。那么由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自我救赎”？或者说，是什么导致了传统哲学、现代世界以及我们自身需要被“救赎”的困境？在阿多诺看来，答案就是“同一性”。

在阿多诺的哲学中，“同一性”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还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所固有的一种组织形式和思维模式。阿多诺正是试图从哲学和社会学批判的视角来批判这种组织形式，反思这种思维模式。为此，他必须深入到已有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内部框架中，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这一目标。在此过程中，“否定的辩证法”的“同一性”批判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视野。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此问题上，“否定的辩证法”甚至没有表现出与康德哲学乃至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本质区别。在“否定的辩证法”全面批判的战斗外衣之下，它仍然恪守着揭示、塑造人（主要是“个体”）的存在的“澄明之境”的基本哲学使命。只不过这种“澄明之境”的获得，不再像康德哲学那样在表象性的“经验”的范围之内寻求先验的逻辑基础，也不再像胡塞尔那样寻求认识发生的确定性前提，而是要通过全面和彻底的反思、批判和打碎主体自身和整个人类社会所建构的理性思维方式，揭示被启蒙理性和现代文化所蒙蔽的主体性，最终开启通往未来社会的可能空间。

鉴于这种初衷，在“否定的辩证法”的视野中，这种起着蒙蔽作用的“同一性”全面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思维和现实的各个层面。在现实的层面上，它贯穿于全部的社会关系中，全面统摄着人的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造就了现代人类文明的极端性，为现代文明的社会灾难开启了大门。在阿多诺看来，这种“同一性”无处不在：它存在于人的思维方式中，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还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这三个领域中的同一性相互呼应，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力量，构成了现代性的枷锁，反过来控制着人自身。也正是在这种视野中，“否定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概念用语上的交集，特别是在马克思早期所使用的“异化”概念上。在资本主义高度“同一性”的社会关系中，“彻底的社会化意味着彻底的异化”^①。这不仅表现为被法西斯所利用并扭曲了的“集体”意识、非

^①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52页。本书将阿多诺译为阿道尔诺，下同。

理性的“崇拜”，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技术化”，还表现为阿多诺所暗示的苏联意识形态，等等。更加复杂的是，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异化以对社会分工的自觉掌握而宣告结束；而在阿多诺那里，这种“交集”不以理论归宿和方法论的重合而结束，而是始终紧盯其批判对象：“同一性”不消解，“异化”就不可能结束。

这种从“同一性”批判切入现代性批判，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视角，与“马克思哲学”^①带有超越性的批判视角形成了重大区别，由此也构成了与“传统/正统马克思主义”^②解读模式的重大区别。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对待马克思哲学首要的、基本的“实践”概念的态度上，还表现为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历史与逻辑的关系问题上。实际上，这也关系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离马克思究竟有多远的问题的解答。

在“否定的辩证法”对资本主义时代大加鞭挞的同时，还隐含着另外一个领域的批判——它也通过对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反思和批判，审慎地对待当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明。在社会关系领域，在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视域中，“阶级斗争”是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只有经历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洗礼的“人民群众”，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创造的主体，成为新的时代环境下历史的推动者和社会的创造者。相比较之下，“否定的辩证法”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鲜明的“非马克思主义”特征。它认为，作为主体的人，首先是“个体”的人，这也是“人”的唯一合法存在状态。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形态中，无论他/她在社会关系上属于哪一个阶级，实际上都正在经历着一场现代社会的同一性灾难，尤其是在主体的思维方式领域。实际上，在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思想背景中，“公民”与“人民”存在若干差异。相较于“公民”，“人民”包含更多的政治性意蕴，需要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否定的辩证法”则试图把“公民”在意识形态的独立性方面推向极端，不仅和国家意识形态保持张力，而且彼此之间也要保持张力。在此，我们可以再次回到现代西方政治学对古希腊城邦和平民关系的分析中来。

^① 鉴于文本梳理的需要，本书中的“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的哲学”特指立足于马克思生前文本（及其与恩格斯合著）的哲学思想。同时，本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在社会历史的统一性问题上，二者不存在本质性区别。

^② 在此，“传统”与“正统”是在相同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在“否定的辩证法”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把“传统/正统马克思主义”限定为以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特指列宁时代的激进革命意识形态时期和斯大林时代的理论体系化模式时期，不包括赫鲁晓夫时代的改良探索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混乱消解时期。苏联形态的前两个时期，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般人对自己的局限缺乏自觉，加上煽动家善于利用，会造成一个民主城邦随时可能失控。煽动家与平民形成的一拍即合的关系，因为煽动家知道他只能向人民提出人民已经有心相信的事情，人民则只相信那些告诉他们所求有理的人。于是，世界史上首次出现一批“我要这个”与“我就要这么做”之间没有转折的人。^①

从批判对象上看，“否定的辩证法”对“同一性”的批判典型地体现了它与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距离”。这源于“否定的辩证法”对启蒙理性以来上升到统治地位的“肯定性”思维的认识。对“启蒙理性”的这种批判虽然并不妨碍“否定的辩证法”使用若干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方法，但构成了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阿多诺认为，从近代西方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自从笛卡儿哲学把固定不变的、量化了的确定性因素作为哲学自身追求以后，哲学思维中的否定性力量便逐渐被肯定性的思维框架所主宰，由此形成了一种量化的、肯定性的思维模式。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中，外在的多样化的经验世界从哲学的领域中被排除出去了，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隐藏在整体性思维体系中的理性的“自负”或理性的狂妄，进而产生出了（被抽象化了的）整个世界协调一致、井然有序的虚假幻象。沿着这一思路，“否定的辩证法”把思维抽象与商品交换原则在实践问题上等同了起来，进而也就把分工同主客体的分裂以及主体对客体的统治联系了起来。

抽象——没有它，主体根本不会是一般的构成要素，甚至按照极端的唯心主义者费希特的观点也不会这样——反映来自体力劳动的分裂，从抽象与体力劳动对立就可以知道这一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告诫拉萨尔派的成员，与流行的社会主义者的习惯性祈祷不同，劳动不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不过是说，劳动既不能以勤劳的双手的形式，也不能以精神生产的形式实体化。这种实体化只是扩大了的生产原则占优先地位的幻觉。^②

沿着这一思路，“否定的辩证法”形成了一种立足于思维方式来解释

^① [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第27页。

^②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 B. Asht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 pp. 177-178.

社会关系的视角。在“社会统治的基础是什么”或者说“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上，阿多诺显然给出了与马克思哲学乃至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截然不同的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关系的巩固，其直接根源被归结为思维的领域：“由推理逻辑发展而来的一般思想及其在概念领域内的支配作用，都是在支配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得以提升起来的。通过概念统一性来实现对巫术传统以及旧的松散观念的摈弃，表现出一种由自由民通过命令所确立的生活等级体系。”^①

在压迫性社会关系如何产生的哲学分析中，“否定的辩证法”亦与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视角产生了重大分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立足于社会生产方式，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分析了压迫性社会关系的历史生成及发展阶段。在这样的视角中，人类社会的两次分工成了社会生产结构整体变迁的标志性事件。而且在这样的视角中，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统治的基础是普遍性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它构成了制约社会关系文明程度的历史前提，并在这个意义上确定了社会生产力最终的、“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性地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多诺选择了从暴力的角度进行压迫性社会关系的历史解读。这种解读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暴力”与“否定的辩证法”存在内在的契合。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社会关系的解释立足于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的每一个层面，均与马克思的哲学产生了巨大的不同。

第一，在“同一性”社会关系的起因方面，暴力成为基本原因。“好战的优等种族总是把自身置于安全之所，对被征服土著居民施以控制。众神之神形成于这种市民社会之中，国王作为武装贵族的领袖，控制着被征服者和土地，而医生、算命先生、手工业者和商人之间也形成了社会交往。随着游牧生活的结束，建立在一定的所有制基础上的制度便形成了。统治和劳动分离开来。”^②在这里，“暴力”成为“同一性”的社会表现，“统治”实际成为暴力分析必然会导致的一个逻辑后果。在这样的逻辑序列中，相较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原初的历史”的观点，生产以及立足于生产的和平交往的维度实际上被消解了。

^①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页。

^②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页。

第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否定的辩证法”把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等同看待。在对世界进行“同一性”解读的视角中，“事物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即永远都是统治的基础。这种同一性构成了自然的统一性”^①。在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同一性”批判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关于真理的知识转化为关于管理的知识，“在征服世界的进程中，自我学会了遵守现行秩序和接受从属地位，但他很快就把真理与管理思想等同起来”^②。最终的结果就是，人类社会由早前时期对自然和社会同一性神话的恐惧转变为现代民众的盲从和不自由的加剧——“自然作为现象与本质、作用与动力的二重性曾经使神话与科学变成了可能，这种二重性正源于人类的恐惧，而恐惧的表达则变成了解释”^③。

第三，语言成了人类恐惧的帮凶，成为“同一性”实现历史传承的工具。在“否定的辩证法”看来，人类恐惧感的历史传承离不开语言这一媒介。人类社会早期因恐惧而产生的神圣感也通过语言流传了下来。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这种神性，语言经过同义反复又变成为语言”^④。相较于前一种作为交流媒介的语言，后一种语言实际上是渗透着人类恐惧及其虚构的神圣感的语言“意识形态”，它的内部隐藏着一种人类社会自我施魅的“同一性”。“人们通常喜欢把概念说成是所把握之物的同一性特征，然而，概念由始以来都是辩证思维的产物。在辩证思维中，每一种事物都是其所是，同时又向非其所是转化。这就是观念与事物相互分离的客观定义的原初形式。这种形式在荷马史诗中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在近代实证科学中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这种辩证法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它是从那种恐惧的嘶喊，以及恐惧本身所带来的二重性和同一性特征中发展起来的。”^⑤

第四，在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更替方面，循环基础上的相互关联成为基本的逻辑规则。阿多诺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对自然的恐惧产生了神话。人类多神崇拜的思维方式既表现出对自然的敬畏，又隐

^①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6页。

^②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页。

^③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1页。

^④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1页。

^⑤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1页。

藏着想控制它的渴望。在此视角中，自然界被抬升为高于人类主体的他者。在资本主义时期，人类以征服者的姿态面对它，掠夺它，宰制自然界。自然界沦落为一种工具性的对象物，丧失了神性的光芒，失去了多神、多质的独立价值色彩，最终成为一种纯粹工具性的存在，成为一种依附于“同一性”的被动存在物。这种基于工具理性的人对自然的控制，由于技术的中介反过来又作用于人类社会，形成一个“遭技术劫掠的世界”^①。在这样的世界中，个人的独立性，自我存在和选择的多质性，以及关于自然界异质性和丰富性的认识，被不知不觉地抹杀了，最终成为一个同质化的、异化的、市场逻辑的工业复制品。

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这种反思，阿多诺并不是第一人，更不是孤行者。早在 1749 年，在欧洲资本主义全面上升的时期，卢梭就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在我们的风尚中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举止要循规蹈矩，做事要合乎习惯，而不能按自己的天性行事，谁也不敢表现真实的自己。在这种永恒的桎梏下，构成这个称为社会的一群人，如果没有更强大的动机使他们脱离这种状态，他们就会永远处于那个环境中，永远做着那些事。”^②最终，卢梭对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最后结果与人类的福祉的关系做出了否定性回答：“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日趋完美，我们的心灵便日益腐败。”^③

一百多年以后，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动荡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角度进行了理论的和社会的探索、实践，并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法西斯肆虐的时代，卢卡奇、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等西方知识分子，在全面审视、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基础上，试图开辟一条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和僵硬的第二国际的第三条道路^④，从而催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学术流派。这一道路上，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之所以具有典型性，一个重要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他以貌似非常革命的“绝对否定”的逻辑颠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① [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 84 页。

^② [法]卢梭：《卢梭全集》第 4 卷，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第 384 页。

^③ [法]卢梭：《卢梭全集》第 4 卷，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第 386 页。

^④ 在第三条道路是什么的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始终未能形成定论，法兰克福学派各成员之间也呈现出明显的各自为战的特点。我们经常依据《历史与阶级意识》，把卢卡奇定位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肇始者，但是他并不能被划入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因为卢卡奇与欧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存在诸多本质上的不同。

的肇始者们的初衷，结果却使得崇高的社会革命沦落为一种悲哀的自我救赎。“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①

与这种“跳蚤”形象相适应的是，“否定的辩证法”刻意保持着一种“不成体系”的“辩证法体系”，但这也并没有完全脱离它所生长的时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后果为基础的”^②。“否定的辩证法”也是在反思和批判现代西方理性文明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它始终没有放弃的是对现代西方文明出路或资本主义现代性前途的思考。换言之，在“否定的辩证法”的视野中，传统哲学认为是“跳蚤”的地方，恰恰是文明的真正“龙种”。

在卢卡奇那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之前存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清算”阶段——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那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问题当然构成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是并没有上升为一个独立的革命阶段）。无产阶级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清算”，使自身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具有了真正的区别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团结一致的阶级意识，在意识形态上真正作为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的阶级而存在，进而进行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因此，卢卡奇并不拒绝“统一性”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虽然卢卡奇曾经明确指出，“总体的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③，但这更多是相对于程度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于本质区别而言的。

相比较之下，对于“否定的辩证法”来说，问题不在于“同一性”的程度，而在于“同一性”本身。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阿多诺实际上把卢卡奇的以“阶级”为主体的“意识形态”革命转变为以个体为主体的“个体主体性”革命，从而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救赎”^④的瓦解的极端。相对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544页。

^③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61页。

^④ “阿多诺的文章最后总是以对救赎的前景的概览作结。有时候他把内在性关系的瓦解归因于这种关系本身的总体化，归因于这种关系自身的基础在由这种总体化所造成的非同一性存在中的彻底毁灭。有时候他又认为这种关系的瓦解是由于无法实现其自身对于总体性的要求而产生的失败。”参见[德]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孟登迎、赵文、刘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416页。

依靠“同一性”建构起来的已有人类文明成果，这是一种“再度失去自身”甚至是“不断失去自身”的壮士断腕般的“自虐”式救赎。因为在阿多诺看来，现代同一性文明中的每一个人“通过否认自身，向自己确认了自身；通过遗失自身，来拯救自己的生命”^①。为此，他不仅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批判一切具有“同一性”形式和内容的意识形态；他不仅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也暗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否定的辩证法”的视角中，任何试图借助于“同一性”的解放和救赎都无异于饮鸩止渴——任何同一性意识形态都是一种欺骗，任何具备同一性意识形态的社会都是一种虚假社会。

“否定的辩证法”反“同一性”的观点和立场，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否定的辩证法”一定程度上“拿来主义”地使用了马克思、弗洛伊德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既有理论术语和资源，是在“反法西斯主义”的独特社会背景中，对文明社会赖以建立和运行的基本组织原则的反思——这种组织原则就是“同一性”。对“同一性”的反思，一直存在于西方哲学史和近现代政治学发展历程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分类，表现出内心深处对“民众”或“人民同一性”的疑虑和恐惧。在他看来，人民容易成为“暴民”，智者学派的演说术实质上是一种“暴民演说术”，因为“一般人没有能力独立思考，因此也没有能力判断别人思考的结果是不是有道理；他认为自己能了解公共事务，而且只相信那些告诉他他了解这些事的人；他喜欢别人将事情化繁为简说给他听，并且喜欢有人帮他为复杂的问题找个简单的答案……集合在一起的一般人是一只巨兽，等着安抚、喂食、讨好，然后牵着鼻子走”^②。这种观点或多或少也能够对应“否定的辩证法”对“差异性逻辑”的强调：社会批判理论应该强调有差异性的个体，而不是具有高度同一性的“一般人”，即“平民”。

如果说，上述几个方面是在阿多诺哲学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足点问题上进行的，与“马克思哲学”的距离的简略梳理的话，那么，这种梳理的价值定位绝不是以距离确认为基础的全盘拒斥。本书写作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立足点就是：阿多诺哲学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财富和资源借鉴，其对市场化的生存方式和

^①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50页。

^② [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第27页。

现代社会模式的反思，对市场经济时代的人们特别是个体的生存处境，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从如何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文化对人的存在的全面包裹——的层面，试图探析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独立的主体性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对于阿多诺来说，这是他毕生所冀求的、用“主体”的力量来对抗“同一性”管控的道路。

为此，要理解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乃至整个阿多诺哲学，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他的理论结论，而是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他的问题：为什么阿多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什么样的立论基础导致了这种结论？这也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在此，本书拟以本雅明的“星丛”与阿多诺的“星丛”“经验”概念梳理为前提，从“否定的辩证法”的思维路径、价值诉求、社会批判等方面，在梳理“否定的辩证法”所刻画的非同一性“认识论模式”^①的基础上，挖掘“否定的辩证法”的社会解读范式及其对于当代的现实意义，力图对上述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解答。在此过程中，本书也尝试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重大进展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基于中国视角的分析，以求在“否定的辩证法”的研究中变“视角借鉴”为“可用资源”。

^① 此处的“认识论模式”，并不意味着整个阿多诺哲学仅仅是立足于和讨论传统的认识论问题，而是说，无论是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还是美学理论中，“否定的辩证法”都致力于推翻“同一性”的社会认识论框架。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是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研究传统的开创者，其特色乃至整个学派的特色是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和文化谴责。问题在于，“否定的辩证法”的整个逻辑框架也没有超脱传统理性哲学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基础。特别是由于实践维度的缺失，其理论批判转向社会批判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一种认识论的视角而不是现实的视角，这就造成了社会统一性向个体主体性衰变的理论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否定的辩证法”并没有真正超脱西方的传统认识论哲学：它在西方传统认识论框架中，试图采用一种相反的逻辑，实现西方文明的“自我认识”“自我反省”和“自我救赎”。